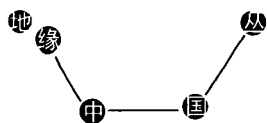


商人地图

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与文化精神

欧人 葛山 著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

商人地图

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与文化精神

欧人 葛山 著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人地图: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与文化精神/欧人,葛山著.
—郑州:郑州大学出版社,2005.5
ISBN 7-81106-072-8

I. 商… II. ①欧…②葛… III. 商人-研究-中
国 IV. F7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4206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

出版人:邓世平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:710 mm × 1 010 mm

印张:22.75

字数:318 千字

版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邮政编码:450052

发行电话:0371-66966070

1/16

印数:1~8 000

印次: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1106-072-8/F·57 定价: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社调换

目 录

序言	1	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
浙江商人	7	最会做生意的部落
广东商人	45	对政治的淡漠与对经商的热衷
上海商人	99	最前沿的商人
山西商人	155	他们的名字叫晋商
山东商人	189	把经商当事业做
北京商人	229	权力与商道的双重运作
东北商人	265	在酒不言商
河南商人	321	憨与奸

序言 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

中国商人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。各地域商人自成流派,逐渐形成了十大商帮。十大商帮中,南方居多,有徽州商帮、洞庭商帮、广东商帮、福建商帮等;北方少之,有山西商帮、陕西商帮等。各帮商人的经营项目、活动范围、经营风格、价值观念等并不完全一样。比如近代山西商帮以善理财、独创票号著称;徽州商帮则表现为亦贾亦儒,贾儒结合;广东、福建两帮商人以海商为主体,表现出亦商亦盗的组织形式。异彩纷呈,各显英雄本色,给中国社会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缘何中国商人集团呈现出区域特征?说到底,从商既是一种经济活动,也是一种文化现象。中国文化的地域色彩是比较明显的。这一点不但中国的学究夫子多有论述,就是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也有亲身感受。19世纪,几度来华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最后写成《中国——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》一书,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9个省的人的文化性格特点。虽失偏颇,却也道出了一些真实。商人经商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观念支配下进行的,他们的经营原则与方式、经营品种与特色,必然会打上地域文化的痕迹,往往会形成一个流派。

我们说明代商人的地位与以前相比,有变化。但总的来说,仍然处于最低等。洪武时期,统治者曾蛮不讲理地规定,农家可穿绸纱、绢布,商贾只能穿绢布。绸纱是高级品,绢布则是粗厚的丝织品,可见在明代的观念上仍然是贱商。在政治上,尽管有的商贾已家财万贯,居室豪华,交结官宦,与文人士互相来往,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大官僚、大地主那显赫的地位。明朝商

常言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不仅仅是
说养活了一方人，更重要的是养育了一方人的
性灵。商道是德道，也是性灵之道。

商人地图

人，虽可向政府购买官爵，但得到的荣衔多于实权。黄宗羲的“工商皆本”思想只能作为一种观念存在，不可能实际操作。整个明代商人被官府敲诈、勒索、鱼肉之现象仍比比皆是。由此，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商人赚了钱后，为何不愿继续扩大生意，而是转向买田置地，或者用于个人享受，或者干脆把钱储藏起来；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早有资本主义萌芽却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；我们还不难理解十大商帮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，为何显得那般茫然无措而一败涂地。

到了近代，中国商人除了遭受封建势力的勒索外，还要受外国殖民势力的欺压。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其境况之险恶便可想而知。为摆脱封建官府的敲诈，中国商人或在外国注册，或挂洋行的牌子；为摆脱西方殖民势力的欺压，中国商人不得不采取官督商办、官商合办等形式，与官府进行“合作”。因此，近代中国商人表现出双重人格。

特别应当提及的是，虽然历代专制统治者非常憎恶商人，但中国官商却一直很兴旺发达。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商。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与中国官商“兴隆”可能有着内在的联系。官商“兴旺”，民间商人就“萎缩”。官商一般凭借特权、地位、靠山垄断市场经营。权力渗透市场，市场上就不可能有公平自由的竞争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我们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，企业一切都由国家包起来，厂长、经理只不过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而已。因而，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工人，而无严格意义上的商人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，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；中共“十四大”又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。市场经济呼唤商人的涌现，同时市场经济又是铸造商人的大熔炉。可喜的是，中国商人虽不成熟，但已形成一个阶层，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流派。前商业部长胡平先生说：“新商人已形成京派、海派、港派三种不同风格的流派。他们既竞争又联合，成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。”胡平说，京派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

出,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。权力与信息构成了京派商人的一大特点。海派商人的特点是精明、但有的地方不高明,当然这一现象也在改变。港派商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成功地对接起来,形成了一种很有时代特色和开放特色的商业文化模式。港派的特点是开放,市场经济意识强。

应当说,胡平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,无疑对商业文化的研究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。我们就是受胡平先生的启发,撮成这部拙作的。就中国大陆商人而言,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三大流派,即江浙商人、岭南商人及北方商人。

江浙商人是指江苏、浙江、上海一带的商人,这一地区历史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,有重商之传统。近代以来,江浙一带处于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之地,故商业活动带有西化和传统的双重角色,如同“上海滩”这个概念一样,处于内陆,同时又经受西方文明的涤荡、洗礼。如近代上海商人和浙江宁波商帮等,他们受西方经营思想熏陶,具有西方商人的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,对新事物极为敏感,能不失时机地开拓新领域,不失时机地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。在商务活动中,适应和吸收能力特强。因此,近代江浙商人中出现一大批著名的实业家和金融家,形成近代史上特有的金融工商阶层。从近代意义上讲,他们是中国真正的商人,具有商人的现代素质和经营思想,他们精明灵活、富于机变、注重市场、注重实利,同时又较有文化涵养和品位。

岭南商人,是指广东、福建一带的商人,近代岭南是最早向外开放,最早受西方文明的侵淫和较少地受到传统文化束缚的地区。由于受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影响,同时又面向海洋,经常与海打交道,所以这一带历来重商不重农,有着商业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因此,有人说,他们是商人的后代,具有天赋“商”才。尤其自近代以来,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,岭南商人显得更为活跃,更为开放,表现的海商特色浓厚。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

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没有提到徽商。
安徽处于黄河长江之间，又处于珠江中游。
这是个更为特殊的群体吧？

商人地图

放以来，广东、福建一带深受港台文化和商风的熏陶，岭南商人以开拓性、冒险性、敢为天下先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、善于竞争著称于大陆；他们的生活观念、消费观念、经营观念，接近港派商人；由于他们自身文化素质大多不高，受教育程度较浅，给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带来障碍。所以，有人说他们是纯粹的“经济动物”。岭南商人的未来发展面临挑战！另外，由于香港商人与岭南商人同属一地域，历史上又同属岭南文化，而岭南商人又多受其影响，所以，我们把香港商人也划归岭南商人。

北方商人是指黄河流域、关东一带的商人。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商人介于北方商人与江浙商人之间，但相对于江浙商人，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更深些，其特征更接近北方商人，所以我们将这一地区的商人划归北方商人。北方商人是某种意义上的传统商人，他们重义轻利，吃苦耐劳，经商往往是被动的，有着非经济因素制约之背景。由于深受农业文化、小农经济的长期束缚，他们大部分商业头脑不够灵活，不太注重市场信息，不大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，不善竞争，缺乏对商业的忠诚和执著追求；商人身份不明确，今天可能做生意，明天可能小富即安，或买田盖房，或从政为官。由于深受重本抑末、重农轻商的传统影响，在他们的观念里，商业是政治的附属物，做生意就是挣钱，缺乏大商业头脑和现代意义上的商人素质。即使出现少数大商人也都与政治有某种微妙的关系。在中国传统商人眼里，官商一体，始终难舍难分。

以上，对中国大陆三大商人流派的划分，会在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中，引起不同见解，我们旨在抛砖引玉。当然，在各派商人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，在商业精神和经营风格上会有一些小地域特色。如北方商人中，山东商人奉行以苦为乐，苦干实干；山西商人善于理财，有金融之才，山西票号，曾经执中国金融界牛耳；江西商人小本经营，擅长小本买卖；安徽商人，亦贾亦文，贾而好儒等等。而这种差异正是本书研究的重点。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关于中国大陆商人三个流派划分的脉络。

商道源自人道，商本复杂，人
更复杂，读商人地域性格，又多
了一道地域的复杂风情，好玩！

序言 中国商人的地域性格

然而，无论是北方商人、江浙商人还是岭南商人，都是黄皮肤的中国商人。与西方商人比，由于文化背景不同，他们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。比如，在餐桌上，西方商人吃美食，中国商人谈生意；在谈判桌上，西方商人是利益大于人情，中国商人是人情大于利益；在用人上，西方商人雇能赚钱的人，中国商人雇家族里的人；在对待下级方面，西方商人出于目标管理，中国商人是出于培养下属成才；面对成绩，西方商人坦然肯定自我，中国商人谨守谦虚原则；等等。这一问题，我们在《商是论衡——中西商人的商运契机与商业精神》一书中已做了论述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江浙、岭南、北方三派商人的经营风格与商业精神，没有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，南北文化交流的频繁活跃，商人的地域色彩也会日趋弱化，但终不会消失。

江浙商人

最会做生意的部落

在传统的语言方式中，江苏、浙江两地
往往以“江浙”这一概念并称。并究其原因
用，一是地理，二是人文，现在分开了，大概
是两地人的进化发生了变异？

浙江商人 最会做生意的部落

浙江现象与浙江商人

这是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热土。

从1978年到2001年，浙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124亿元增长到6700亿元，年均增长高达13.1%，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。2002年，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又比上年增长12.3%，达到7670亿元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6570元，按现行汇率计算，已经超过2000美元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多。

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，浙江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序不断上升。从1978年到2001年，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由第12位、第13位跃升至第4位，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由第11位跃居第4位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第9位、第8位上升均居第3位，对外贸易总额亦由第13位变为第4位。2004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超万亿元，成为全国第4个超万亿元的省份。

一个人多地少（人均耕地仅为0.05亩），资源相对贫乏，工业基础相当薄弱，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扶持的省份，在过去短短的20多年，创造出了惊人的经济成就，浙江一跃成为经济活跃、人民富裕的经济大省，“浙江现象”倍受世人关注。

透过一连串的统计数字，我们发现创造这种经济奇迹的主体不是别人，而是一群精明能干的商人。

在2000年《福布斯》“中国50首富”排行榜上，浙江有9位企业家榜上有名；而2001年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，浙江占了17位；2002年浙江则

范大夫粮生何事，做官于浙（越）
为高于江苏（吴），乃是浙商有处
值得称绝的地方。

商人地图

有 11 位。尽管福布斯中国富人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，但国内官方的统计结果并没有否定这些估计，甚至更为乐观。2004 年福布斯首次推出内地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，前 10 名中浙江就有 4 个：杭州、宁波、温州和绍兴。而且杭州、宁波更雄踞冠、亚军。

1999 年度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，浙江占了 112 家，总量位居全国第一。其中 4 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 10 强，而在 2001 年，500 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 188 家，一省就占 1/3 强。在全国工商联公布的 2001 年度全国民营经济 10 强中，浙江占了半壁江山，其中万向集团公司、正泰集团连续 4 年名列前 10 名。

2001 年 9 月底，浙江民营企业突破 20 万户，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 1 600 亿元，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 2.46 万家，位居全国第一。浙江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也居全国首位。全省私营企业总户数、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、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、销售额、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。

浙江商人成了人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经营群体。

浙江人经商的历史十分悠久，浙江人的经商本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显露出来了。春秋时期，有个叫范蠡的河南人服务越国，在辅佐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后，毅然辞官下海，因经营有术，富甲天下，成为中国商人的开山鼻祖。范蠡虽不是浙江人，但受着浙江人文环境的影响。晋时，宁波“商贾已北至青、徐，南至交广”。从唐朝一直到南宋，宁波、温州都是有名的贸易港口。白帆蔽日般的商船往来于日本、高丽、真腊（柬埔寨）等国，江南的丝绸和瓷器被源源不断地泛海运出。李邻德、李廷赤、张支信、李处人等精明能干的大商人的船队依靠航海发了大财。明清时，官方厉行海禁，公开合法的贸易虽然受阻，但宁波、温州一带的走私贸易却相当活跃，商人甚至还把硫磺、丝棉等违禁物品贩运到了日本、西欧等国和地区。“宁波商帮”在此时期也形成了。



鸦片战争后,宁波、温州等地相继开放,虽然这种开放是在西方列强的刺刀下实现的,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。富有经商传统的浙江人在西方重商主义文化的催化下,经商传统和经营理念得以继承和更新。尤其是宁波商帮,在中国其他商帮纷纷走向衰败之际,依然蒸蒸日上,成为近代中国商界一支生力军。1916年,孙中山先生视察宁波时说:“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,且具坚强之力……凡吾国各埠,莫不有甬人事业;即欧洲各国,亦多甬商足迹。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。”

改革开放以来,浙江人的经商才能更是有了用武之地,乡镇企业迅猛发展,商人铺天盖地,商业发展之快令国人惊异。至2000年底,浙江各类商品交易市场达4488个,年成交额超过亿元的有319个,超过10亿的有69个,“市场大省”名不虚传,柯桥中国轻纺城、中国义乌小商品城、桐乡濮院羊毛

衫市场、桥头纽扣市场都是闻名海内外的顶级大市场。大市场造就大集团。浙江产生了“杉杉”、“雅戈尔”、“万向”、“正泰”、“德力西”、“飞跃”等一批在全国同行中居领先地位的大集团。

中国传统文化是重农文化，“商”处四民之末，商人被打入 18 层地狱。浙江人何以胆大包天，放言营商，且经营有方？

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浙江文化。

浙江地区相对中原地区，开发的时间要晚得多。除了良渚文化漂亮的玉器和河姆渡文化的牙雕、漆碗等寥若晨星的杰作之外，与北中国黄河流域比起来，遥远的百越时代仿佛成了历史的一个暗角。一条茫茫大江和漫长的海岸线使得沟通北方异常困难。那时，越地到处是湿热的沼泽、毒虫及闷热的天气，常常传播瘟疫疾病。雄心勃勃的华夏人用尖酸的口气调侃这里是“南蛮烟瘴地”。越地在历史上也的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百越文化发展的契机是在三国时期。在能干的东吴大帝孙权的经营下，百越地区土地得到开垦，经济得到发展。西晋末年，北方由于战乱，北方人口大量南迁，其中既有农民、手工业者，也有名门望族及饱学之士。他们既带来了先进的农业、手工业技术，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。至南宋时，浙江不仅成了政治中心，而且成了经济、文化中心。从此，浙江彻底摘掉了“南蛮烟瘴地”的帽子，真正成为中国的文化之邦、富庶之地、人文渊薮。

浙江濒临波涛大海，有漫长的海岸线。茫茫大海不仅引发了浙江造船业的产生和发达，而且也铸就了浙江人不畏风险、机智勇敢的品质和商业头脑。而浙江境内丰富的物产又为贸易提供了可靠的货源，于是乎，浙江人的商业意识被激发了。

明清时期，资本主义经济在江南地区萌芽。农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大量破产而加入到农村雇佣劳动者的行列。城镇发达的丝绸业的作坊里，机户与织工之间已失却了往日那种人身依附关系，而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

如像说王阳明为商人撰写墓表是
“破天荒”的事，那么，司马迁为商人作
传记是“破天荒”的事了，开个小小

浙江商人 最会做生意的部落

雇佣关系。杭州、温州、湖州等大中城镇成了商业、手工业的聚集地；手工业作坊、工场林立，有的规模还相当大。各式商行也纷纷诞生。浙江的工商业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倘若中国的统治者们能正视这种新生的经济现象，采取合乎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的政策，积极加以引导和培育，也许中国能缓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……

与此相应，浙江出现了与封建正统思想不合拍的启蒙思想家，其代表人物就是王阳明和黄宗羲。王阳明鼓励人们从经学和理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，冲破压抑人性的牢笼，注重实践，导致了明末清初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兴起。王阳明老先生还为处境不妙的商人做了一次呐喊。1523年，他为商人方麟（节庵）撰写了墓表。休看事小，这可是中国“士”人为“商”人所破的天荒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“义”与“利”、“士”与“商”向来是格格不入、泾渭分明的。王阳明为商人的“树碑立传”，为“士”与“商”的关系作了史无前例的调整。对“荣宦游而耻于贾”的传统，对方麟“弃儒就贾”的举动，王老先生表示，若商贾“尽心”于其所“业”，那么亦无异“圣人之学”，绝不会比士为低。更为值得称道的是，王阳明先生一针见血地评论说：当时的“士”好“利”比商贾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只不过是异其“名”而已。黄宗羲则承王阳明思想之余绪，鼓吹民主思想，抨击封建专制；提倡经世致用，鞭挞封建理学。黄宗羲还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的口号，这无疑是对封建统治者重农思想的挑战。总之，这时期，主张个性解放，反对等级观念，强调人的平等和民本主义等思想构成了浙江文化一个新的亮点，而这些思想是大大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。

与此同时，西方文化也开始影响浙江文化。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，带来了《圣经》，也带来了西方人的文化观念和科学技术。经济发达、文化开明的浙江自然成了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地区。而浙江文化人对外来文明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介绍它，学习它。于是当西方殖民者用炮舰强行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，中国无可奈何地步入近代后，本来就开明的浙江文化就更走向了